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7 月 8-10 日)

1、美国《科技政策报》：联合国人工智能对话应解决多语言鸿沟

7 月 1 日，美国《科技政策报》发表斯塔林研究所(Starling Institute)政策顾问克里斯蒂安·施莱普弗(Christian Schlaepfer)的文章《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应着手解决人工智能语言鸿沟问题》。文章认为，7 月 6 日至 7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会议，应聚焦“多语言人工智能”这一被忽视的议题，着力弥合“语言鸿沟”。前沿模型仅针对少数资源丰富语言优化，低资源语言用户在触达性、实用性与安全性上存在不足，易引发全球不平等问题。此类语言表达相同内容需消耗更多词元，形成推高成本与延迟的“词元税”；模型以英语推理更佳，输出易偏向英语文化规范；将提示词机器翻译为低资源语言更可绕过安全防护、诱发有害内容。文章建议，本次对话可着重三点：一是重新定义议题，将多语言能力视为与“主权”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的国家或地区利益；二是整合跨国研发需求，优先投资多语言数据集和安全对齐研究；三是利用政策杠杆，将模型处理本地数据的许可或公共采购流程，与开发者提升多语言性能及安全

性的承诺相挂钩，缩小技术获取与安全差距。

<https://www.techpolicy.press/the-un-global-dialogue-on-ai-governance-should-tackle-the-ai-language-gap/>

编译：高美琳

2、美国布鲁金斯学会：G7 应采纳人工智能标准提议并强化执行机制

7月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研究员汤姆·惠勒(Tom Wheeler)的文章《七国集团应接受人工智能标准提议，但需确保其可执行性》。文章认为，当前少数科技巨头掌控社会关键认知能力，正形成与传统地理主权并驾齐驱的“信息主权”。为避免各国监管分歧破坏同质化市场，科技企业提议建立共同标准框架，呼吁与政府分担监管责任。然而，由企业主导的标准往往局限于技术层面，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算法偏见及反竞争行为等广泛社会问题。文章强调，七国集团领导人应利用此次契机，接受并改造该提议以重塑治理框架：一是扩大参与主体，打破行业垄断，将政府与民间社会纳入标准制定过程，建立规范企业控制权与促进市场竞争的“行为准则”；二是确保强制约束力，参照七国集团曾推动建立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机制，建立具备实质惩戒与执行效力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避免毫无约束力的自愿合规框架，从而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切实维护公众利益。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g7-should-accept-ai-standards-offer-but-make-it-enforceable/>

编译：孙韵雯

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人工智能智能体冲击网络安全， 欧盟治理与战略双滞后

7月6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欧洲研究员拉鲁卡·切尔纳托尼（Raluca Csernaton）与访问学者帕特里克·帕夫拉克（Patryk Pawlak）的文章《当人工智能智能体发起攻击：自主网络行动与欧洲的治理差距》。文章认为，自主人工智能智能体已从根本上改变网络安全威胁的格局，而治理工具不匹配、战略上依赖美国，是欧盟应对这一转变的两大核心风险。现实案例显示，自主人工智能智能体已具备自主规划、大规模实施攻击的能力，攻击面也从软件漏洞扩展到模型本身。但真正的风险不在模型本身，而在于智能体部署后被赋予的数据访问、工具调用与自主执行权限。当前欧洲《人工智能法案》将军事与国家安全用途排除在外，认证体系仍针对静态、可预测的软件设计，缺乏对部署后行为的实时监控。与此同时，美国正将前沿人工智能作为战略资产整合进网络战略中，欧盟仍以监管与韧性为主导，两者治理路径由此分岔，欧盟因对美基础设施的依赖而被动卷入美方战略逻辑，难以掌握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对此，文章提出四点建议：建立运行时监控与权限限制机制，管控算力与 API

等关键节点，推动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自主网络行动，并倡导欧盟采取“非对称韧性”战略，不追求进攻能力对等，而是强化防御与恢复能力，同时加快摆脱对美国前沿模型的依赖。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research/2026/07/when-ai-agents-attack-autonomous-cyber-operations-and-europes-governance-gap>

编译：杜宛鸿

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特朗普政府需要应对各国的人工智能主权诉求

7月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研究员卡梅伦·F·克里（Cameron·F·Kerry）的文章《特朗普对 Anthropic 最新模型的禁运，彻底扼杀其出口美国人工智能的希望》。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要求 Anthropic 限制外国用户访问 Mythos 5 和 Fable 5 等模型，与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球应用的目标相矛盾，并会进一步强化各国追求人工智能主权的意愿。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应更主动应对各国追求人工智能主权的诉求，将美国的人工智能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全球联盟。一是美国应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外交战略以及“硅和平”（Pax Silica）计划，通过与盟友合作，共同建设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供应链；二是建立更加完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避免政策反复摇摆，增强国际社会对美国人工智能的信任；三是推动国会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立法，对人工智能安全、

治理与风险实施监管；四是提升人工智能治理透明度，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认识人工智能。文章认为，美国若要维持其人工智能领先优势，政府不仅需要支持创新，更需要通过立法与治理，打造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夯实其人工智能出口战略的国际信任基础。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trump-administrations-embargo-on-anthropics-latest-models-scorches-its-hopes-to-export-american-ai/>

编译：程果

5、美国《科技政策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为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提供重要经验教训

7月2日，美国《科技政策报》发表德里国立法律大学传播治理中心执行主任贾拉克·M.卡卡尔（Jhalak M. Kakkar）等人的文章《在联合国启动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之际，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提供重要经验教训》。文章认为，作为联合国两大数字治理进程，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论坛和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UNGDAI）同期举行，这是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吸取互联网治理经验的重要契机。文章指出，UNGDAI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借鉴WSIS的经验教训。在成功经验方面：第一，WSIS率先正式实行多利益攸关方主义，广泛纳入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技术社群，UNGDAI

应效仿相关做法，确保全球南方国家和边缘化社区等多元代表的真正参与；第二，WSIS 将数字政策与发展紧密结合，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度，UNGDAI 也须在其议程和成果中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第三，WSIS 阐明了涵盖基础设施、可负担性、数字素养和内容的全面接入方针，UNGDAI 在探讨“弥合人工智能鸿沟”等支柱议题时，应继承这种整体和多维思路。第四，WSIS 建立了灵活、包容、非约束性的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生态系统，UNGDAI 应直接依托 IGF 等现有架构，而非重新构建新框架。在失败教训方面，WSIS 的对话缺乏实际成果和问责机制，UNGDAI 应聚焦于促成具体承诺，并建立透明的追踪和问责体系。文章认为，在创新加速、权力集中和地缘分裂的当下，联合国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不能从零开始，而应吸取互联网治理的经验，以防重蹈覆辙。

<https://www.techpolicy.press/as-the-un-launches-its-global-dialogue-on-ai-governance-wsis-offers-critical-lessons/>

编译：张佳延

6、美国兰德公司：人工智能竞争胜负取决于风险韧性建设

7月6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布莱恩·A.杰克逊（Brian A. Jackson）的研究报告《打赢人工智能五项全能赛贵在持久：韧性与风险管控是国家人工智能竞争战略核心》。报告认为，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不能只看作研发先进模型的短期冲刺，更

是比拼长期净收益的耐力竞赛，收益需要扣除人工智能事故、滥用带来的各类损耗。判断复杂互联环境下人工智能故障会成为常态，设置四类风险场景推演，风险管控与系统韧性能够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微小的韧性优势长期积累可形成决定性差距。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可划分为技术研发、产业落地、生态主导、军事应用、风险防控五大赛道，风险治理不只是安全保障，更是重要战略抓手。技术先发国家需承担大量人工智能风险成本，而后发主体依靠完善风控体系，有机会在长期博弈中实现反超。报告针对个人、企业、基础设施运营方及各级政府设计分层治理路径，建议搭建分级防控、应急保障与追责保险配套机制，各国应将风险韧性建设纳入顶层人工智能战略，以此持续巩固长期竞争优势。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4718-1.html>

编译：钟珺雯

7、美国 CFR：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援助

7月6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其副总编辑乔纳森·马斯特斯（Jonathan Masters）与数据可视化高级编辑威尔·梅罗（Will Merrow）的文章《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援助》。文章认为，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是接受美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国会通过了五项援助乌克兰的主要立法，提供1640亿美元的拨款，其中直接支持乌克兰的援助金额约为1270亿美元，其余大部分支出用于

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等。大量资金实际上被用于支付国内国防制造业中工厂和工人的费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及盟友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帮助乌克兰抵御进攻以及发起反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尚未通过新的主要援助立法，并曾两次暂时暂停拜登政府时期批准的部分援助。与拜登政府不同，特朗普曾在不同场合指责乌克兰发动并延长了战争，并将自己视为促成和平协议的中立调解者。纵向来看，与国防部每年的预算规模或财政部在金融危机期间提供的经济援助相比，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规模并不突出。横向来看，2025 年，欧洲国家显著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支持。自 2022 年以来，欧洲各国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美国。按国家经济规模计算，许多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比例比美国更高。

<https://www.cfr.org/articles/how-much-us-aid-going-ukraine>

编译：高靓瑜

8、美国《外交事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信任危机

7 月 6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的文章《缺乏信任，跨大西洋联盟便无法存续》。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一系列单边行为引发了跨大西洋联盟内的信任危机，华盛顿若不修复盟友裂痕，恐彻底失去欧洲。特朗普此前指责欧洲盟友“搭便车”并多次威胁退出北约，如今又将欧洲

国家排除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谈判之外，已动摇了欧洲的安全感。欧洲防务开支增长、战略价值凸显，可能开始寻求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倾向于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或重新与俄建立政治、商业和能源联系。美国若任由信任危机持续，将错失与一个真正有能力伙伴结盟的益处。目前欧洲填补了美国对乌援助空缺，还可补足美国防务工业产能，缓解伊朗战争后弹药库存补充的压力，美国不应忽视此价值。因此，美国应将欧洲视为伙伴而非附庸，吸纳其参与乌克兰及伊朗谈判、共商撤军事宜，并接受欧洲降低对美国防工业依赖的需求，以赢回欧洲的信任。美国若将欧洲视为真正伙伴以构建成熟的关系，将获得更强大的盟友，为自身全球领导力奠定可持续的基础。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ato-transatlantic-alliance-cant-survive-without-trust>

编译：李泓静

9、美国 CSIS：美国对沙特安全关系具有两面性

7月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高级顾问、前美国驻沙特大使迈克尔·拉特尼（Michael Ratney）与中东项目顾问阿卜杜拉·阿尔赫纳基（Abdullah Alhenaki）的文章《伊朗战争如何影响美沙伙伴关系以及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文章认为，伊朗战争并非沙特主动谋求，美方未征询沙特立场，但这场冲突对沙特安全与经济产生的冲

击，远比美国更为直接，成为近期升级的美沙安全伙伴关系的一次现实检验。这场战争改变了沙特对美安全合作的认知。利雅得希望借强化对美安全关系降低伊朗威胁，甚至考虑借对以关系正常化换取正式安全保障；但在战争中，美国在目标、时机和如何保护沙特方面缺乏清晰沟通，且一度难以满足海湾伙伴的防务需求，使沙特开始将美国既视为主要安全伙伴，也视为重要风险来源。尽管如此，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又进一步强化了沙特对美国防空系统、情报共享及军事准入安排的现实需求，美沙安全关系因而并未走向破裂。伊朗战争也削弱了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此前沙特认为与以色列靠近或可带来安全、技术和地区稳定收益，但战争表明，与以色列关联越深，遭受伊朗打击的风险也越高。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拒绝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使沙特更难接受关系正常化。文章认为，美沙安全伙伴关系仍有稳定和深化空间，但沙以关系正常化短期内难有进展，除非地区环境和以色列对巴问题的立场发生根本变化。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ow-iran-war-weighs-us-saudi-partnership-and-prospects-normalization-israel>

编译：刘晓

10、美国《国家利益》：竞争战略理念助美应对中俄挑战

7月7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美国海军战争学

院海事战略系主任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文章《美国需要重拾“竞争战略”理念》。文章认为，安德鲁·马歇尔在冷战时期开创的“竞争战略”理念，核心在于将长期地缘竞争引向己方强势而对手弱勢的领域，而不仅仅是靠军备竞赛拖垮对手。马歇尔团队通过研究苏联历史文化，发现其偏向防御性，据此制定策略诱使苏联海军退守近海“堡垒区”，并利用航母战斗群在其周边施加压力，以减轻大西洋航线的压力。这一思路成为 1986 年美国海事战略的基础。文章提出，竞争战略有四个关键维度：经济活力、时间（长期竞争而非速胜）、文化（利用对手的先天倾向）和军事技术。当前，美军面临以昂贵弹药打击廉价无人机和导弹的不可持续成本问题，美国应借鉴马歇尔团队的共同智慧，重新审视竞争战略逻辑，将竞争引向美国持久优势领域，例如针对中国在近海布设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止网络，潜艇力量正是美国可以利用的长期优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needs-another-look-at-competitive-strategies-jh-070726>

编译：白一冰

11、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美欧分歧加剧削弱北约团结与威慑能力

7 月 6 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其高级研究员玛丽恩·梅斯默（Marion Messmer）的文章《美

欧紧张关系笼罩北约峰会》。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减少对欧洲安全的介入，并因伊朗战争等问题与欧洲盟友分歧加深，正削弱北约团结与威慑能力。安卡拉北约峰会前的内部紧张局势较往年更加严峻。特朗普政府减少对欧洲安全的介入，加之欧洲盟友未按美国期望支持对伊朗行动，使美欧分歧进一步加深。文章强调，跨大西洋防务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美国可能推迟欧洲军购订单，加深欧洲对其安全承诺的疑虑；欧洲正加快重建本土国防工业能力以降低对美军备依赖，但美国在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仍希望其继续采购美制装备。此外，美国减少在欧洲的部队和装备部署，也削弱其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同时，欧洲内部就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出现分歧。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奉承策略争取特朗普支持，既因迎合特朗普受到欧洲批评，又因无法推动北约支持美国对伊朗行动而未获白宫认可，局限性进一步显现。文章强调，俄罗斯仍是北约面临的首要安全挑战，但成员国战备能力、改革进度不一以及联盟内部政治分歧可能削弱北约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文章呼吁减少峰会消耗，将更多资源投入联盟亟需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7/tensions-between-us-and-europe-loom-large-over-nato-summit>

编译：贺宇希

1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络与结构性权力四大趋势正

在削弱美国影响力

7月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其高级研究员丹尼尔·W·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的文章《网络与结构性权力：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四大趋势》。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依托国际金融、科技、供应链等全球网络形成结构性权力，但近年来美国将网络权力更多作为施压工具，正削弱自身影响力。文章认为，美国结构性权力正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高估网络权力的自我强化能力，过度施压削弱全球对美国主导网络的信任；二是越来越多对盟友使用网络权力，促使盟友重新评估对美国网络和制度的依赖；三是不断提高对目标国家的施压要求，但未能相应提升政策效果，削弱了网络权力的威慑作用；文章认为，中国等竞争对手正加快建设替代性网络。中国一方面持续降低对美国网络的依赖，加强自身科技、金融等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不断发展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等新的国际网络，在部分关键矿产、医药原料、电池等领域形成较强影响力。虽然这些替代网络目前整体规模仍小于美国主导体系，但未来可能逐步增强竞争力。文章认为，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攫取性的网络战略，而其他国家认为这种做法将长期持续，随着加入美国网络的成本不断提高、收益不断下降，越来越多国家可能选择发展替代网络，美国结构性权力将因此受到削弱。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6/07/network-and-structural-power-the-four-trend-lines-weakening-us-leverage>

编译：罗方婕

13、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洲应扩军增支并长期押注跨大西洋安全关系

7月2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常驻高级研究员伊恩·布热津斯基（Ian Brzezinski）与跨大西洋安全倡议副主任菲利普·迪金森（Philippe Dickinson）的文章《欧洲应长期押注美国及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北约3.0，旨在减少美国驻欧兵力和对北约作战计划投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常规防务责任，同时继续依托美国核威慑。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持怀疑态度，并释放撤军、削减关键能力等信号，但美国在欧洲部署仅占其全球兵力一小部分。美国公众和国会对北约及援助欧洲盟友仍保持较强支持。欧洲不应因当前分歧追求与美国彻底脱钩，而应加快扩充军力、增加国防投入，展示对共同安全的实际贡献，避免美军撤出形成不可逆局面。文章认为，欧洲若能成为净安全贡献者，并把握安卡拉峰会契机巩固联盟基础，跨大西洋关系长期仍可能更具韧性、能力与战略价值。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europe-should-take-the-long-bet-on-the-us-and-the-transatlantic-security-relationship/>

编译：黄千茹

14、美国《外交事务》：欧洲需与普京直接对话

7月7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文章《欧洲如何才能引起普京的注意：欧洲大陆必须克服其俄罗斯困境》。文章认为，面对俄欧关系持续恶化、军备竞赛升级、混合攻击增多以及美欧安全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危机外交中的协调作用严重削弱，加之北约东扩、核威慑讨论升温以及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军事决策等，双方误判和意外升级风险显著上升，欧洲正面临重演冷战导弹危机的危险。因此欧洲应主动恢复与普京的高级别直接沟通渠道，而非寄希望于孤立俄罗斯或完全依赖美国。欧洲目前既缺乏统一的对俄代表，也缺乏明确的谈判议程，应由法国、德国、英国联合芬兰（或波兰）组成“小范围意愿联盟”，代表欧洲直接与普京接触，在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同时，推动俄欧关系稳定。欧洲可通过领导人联名密函，提出建立热线、危机管理团队和军事事故沟通机制，并以共同防止欧洲大战、讨论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议题吸引俄方回应，同时应明确表明欧洲重整军备将持续进行，不会接受按俄条件重塑安全秩序，任何关于欧洲未来安全架构的正式讨论都必须以在乌停火为前提，并与美乌共同推进。随着俄军损失增加、国内压力上升及欧美力量对比变化，普京未来可能更愿意与欧洲谈判，尽早建立沟通渠道不仅有助于降低战争升级风险，也有助于影响俄罗斯决策层政治预期，并为2029年美国可能重新深度参与

欧洲安全谈判奠定基础。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how-europe-can-get-putins-attention>

编译：郅捷

15、美国 CSIS：乌克兰打击俄能源设施催生俄“燃料焦虑”

7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欧洲、俄罗斯与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玛丽亚·斯涅戈瓦娅 (Maria Snegovaya) 与杰德·麦格林 (Jade McGlynn) 的文章《随着战争的影响逐渐显现，俄罗斯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文章认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及交通枢纽的持续打击，正通过引发燃料短缺等切实经济代价，触及俄罗斯民众日常生活，可能成为影响其冲突态度的关键转折点。民意层面，俄罗斯社会大致分为两支亲战群体：约占15%的“鹰派”，意识形态驱动，要求更强硬军事行动，面对冲击易产生“聚旗效应”；而占35%—40%的“效忠派”，更愿独善其身，对政治兴趣较低，面对个人生活受损更易撤回对战争的支持。调查显示，经济状况对战争支持度的影响超过军事进展。2022年以来，战时政府支出曾推动实际工资快速增长，支撑较高支持率。然而自2026年初经济恶化、增长停滞以来，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受访者创20年来新高（56%），认为国家发展方向正确的比例降至2022年2月以来最低。创纪录的81%受访者支持“明天就结束战争”。乌克兰

兰的无人机打击兼具军事冲击与经济损失双重属性。燃料短缺造成了战争代价的“亲身体验”，其影响绕过部分信息管制，通过民间众包地图等渠道广泛传播。排队现象在俄罗斯文化中象征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物资，其“可见性”部分抵消了社会原子化。尽管鹰派可能要求更强硬回应，效忠派更倾向于将代价归因于持续战争，撤出支持。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ussian-attitudes-are-shifting-wars-effects-come-home>

编译：黎彤

16、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关键矿产战略面临中国资本隐性威胁

7月8日，《国家利益》网站发表欧韩背景研究者、国际贸易与政治政策分析师贾·金（Gia Kim）的文章《美国关键矿产推进战略面临隐性威胁：中国资本》。文章认为，美国正将关键矿产、电池材料、先进精炼技术和能源供应链纳入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并试图通过120亿美元关键储备基金及美韩关键矿产框架等举措，在中国影响范围之外建设替代性供应链。文章认为，中国当前仍主导关键矿产加工，并能通过出口管制、国内矿业整合和战略储备政策维持供应链优势。然而，美国多元化战略面临的隐性风险在于，中国相关资本可能通过私募股权、主权财富参与、跨境投资伙伴关系和少数股权等方式进入关键供应链节点。即便没有多数

控股，董事会代表权、信息获取和资本配置影响力也可能产生战略意义。文章强调，美国不能以纯商业逻辑处理关键矿产与能源安全，应扩大对战略产业的审查范围，在保持开放投资优势的同时防范中国资本通过隐蔽金融渠道影响关键供应链。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energy-world/americas-critical-minerals-push-faces-a-hidden-threat-chinese-capital>

编译：张泉

17、美国 CSIS：俄军对乌导弹与无人机行动是基于地理的强制战略

7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柏林乌克兰危机观察站分析师马库斯·韦尔施（Marcus Welsch）、CSIS 研究员亚西尔·阿塔兰（Yasir Atalan）、CSIS 高级研究员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和芝加哥大学研究员埃里克·蒂尔斯滕-尼曼（Erik Tiersten-Nyman）的报告《强制的地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导弹与无人机行动》。报告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是一种以地理为基础的强制战略。数据显示，乌克兰的受损报告正急剧增加，且俄罗斯的打击重心集中在前线、南部地区以及拥有工业、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的关键区域。俄罗斯还巧妙地在冬季发动季节性战役，集中攻击能源设施以加剧平民困境。文章认为，莫斯科正利用远程空袭手段干扰后勤补给、压缩关

键基础设施、压制平民，并对乌克兰的作战、修复、治理和谈判能力施加累积性成本。此次行动受到目标的战略价值、沙赫德型无人机发射的快速增长、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袭击，以及前线附近无人机密集杀伤区不断扩张的影响。报告认为，俄罗斯正日益将基础设施破坏、距离和民众脆弱性转化为政治杠杆，试图通过累积成本迫使乌克兰屈服，这也是现代强制战略的发展趋势。

<https://www.csis.org/analysis/geography-coercion-russian-missile-and-drone-campaigns-ukraine>

编译：陆知宜

18、美国 CFR：《大而美法案》重塑美国清洁技术制造业

7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气候与能源研究助理米娅·比姆斯（Mia Beams）的文章《图解<大而美法案>如何重塑美国清洁技术制造业》。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标志性税收法案《大而美法案》（“一个大而美丽的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清洁能源技术产业政策。它取消并加速退出多项清洁技术制造业税收激励，使美国企业更难与全球低成本竞争者竞争；同时取消多项需求侧部署激励，削弱了维持清洁技术制造业长期增长所需的市场信号。《大而美法案》还加大了美国企业管理供应链的难度。法案引入新的采购限制，禁止与外国对手存在联系的企业获得税收抵免。由于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供应链

高度依赖中国零部件，这些限制对相关制造商形成更大负担。同时，美财政部关于“受关注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 FEOC）要求的细则仍不清晰，使企业难以判断自身是否仍可获得补贴，并事实上拖延了未来投资。最后，税收抵免削减、“受关注外国实体”指引不明和贸易扰动共同抑制美国清洁能源制造业。尽管电力需求增长可能帮助市场克服部分障碍，未来国会政策调整也可能提振本土制造业，但在此之前，美国清洁技术制造业仍难以充分释放潜力。

<https://www.cfr.org/articles/how-obbbba-resaped-u-s-clean-tech-manufacturing-in-charts>

编译：刘盈祺

编译：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郜捷、刘盈祺、黎彤、高靓瑜、李泓静、刘晓、白一冰、贺宇希、罗方婕、高美琳、孙韵雯、杜宛鸿、程果、张佳延、钟珺雯

审核：刘源、郑乐锋、许嘉伦、钱嘉童、申青青、周武华